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向天渊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吕进主编)

ISBN 7-5621-2728-X

I. 现... II. 向...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894 号

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

向天渊 著

---

责任编辑:康莉蓉

封面设计:王正端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 邮编:400715

印刷: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16千

版次:2002年4月第1版

印次: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书号:ISBN 7-5621-2728-X/I·131

---

定价:18.00元

# 目 录

总序 .....	吕进
绪论 .....	(1)
第一章 话语主体的审视 .....	(10)
一、中学、西学与东学 .....	(10)
二、学院、民间与广场 .....	(30)
第二章 话语方式的分析 .....	(49)
一、格西到格中 .....	(49)
二、二元及多元 .....	(72)
三、论辩与合谋 .....	(92)
四、个性与族性 .....	(117)
五、杂语至纯语 .....	(139)

第三章 话语文本的解读 .....	(159)
一、谈型与信型 .....	(159)
二、论型与战型 .....	(177)
三、理性与感性 .....	(201)
第四章 话语理路的描述 .....	(218)
一、传统话语的断裂与延续 .....	(218)
二、西方话语的膨胀与误读 .....	(233)
结语 .....	(250)
参考文献 .....	(256)
附录 作者小传 .....	(265)
后记 .....	(267)

# 总摇序

## 吕摇进

摇摇《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是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位点部分导师的最新著作集锦,第一辑一共愿部。此前,在 员怨怨愿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学位点的论文选集《现代文学沉思录》。

对于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的现当代文学学位点,仅仅出版第一辑显然不够,我们计划在明后年编辑出版第二辑、第三辑。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实力、优势和特色的“老”学位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抗战文学研究、西部文学研究均具相当基础和规模。一支年轻的主要由教授和博士构建的学术梯队组成了西部学术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学位点早在 员怨怨缘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生,已先后有 员缘届硕士生毕业。学位点带头人在 员怨怨远年增列为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员怨怨苑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有两届博士生毕业。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位点建设始终得到学界前辈的热情关怀,得到同行的支持和帮助。在 员怨怨猿年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全国硕士点查评中,专家组除了对学位点给予好评并评定为

“粤”级外，还在向学位办反馈的《专家组意见》里特地提出了“尽快建成博士点”的期望。这个期望一直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召唤着我们。

怨年过去了。作为学位点带头人，我深感内疚：愧对学界的期望，也愧对怨年来在学位点建设上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的同事们。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间世的。

近几年来，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 20 世纪中国的辉煌一页，这是举世瞩目的一场静悄悄的然而非常深刻的革命性过程。在实践中，人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西部大开发既是西部经济资源大开发，又是西部教育资源大开发。因为，西部大开发的最后落脚点不在其他，而是在人。经济的高度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的竞争：人才竞争，人的文化程度的竞争，人的素质的竞争。人，正是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对象物。完全可以说，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大力发展教育，尽快改变西部教育相对滞后的现状，就是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明慧选择。

重庆素为西部重镇与中心。禹分九州，即有巴蜀。在上世纪中叶，重庆曾为抗战时期的陪都，近年又为中央直辖市。重庆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西南师范大学所在的重庆北碚也是一座文学“故事多”的美丽“小城”，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底蕴丰厚之地：梁实秋的“雅舍”，老舍的故居，复旦大学夏坝旧址，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都在诉说着北碚的昨天。当年，老舍、林语堂、梁实秋、端木蕻良、萧红、胡风和“七月派”诗人云集在这座小城。郭沫若、茅盾、冰心、艾青、田汉也常来北碚讲学和从事文学活动。20 世纪的一些名著，如《四世同堂》、《雅舍小品》即诞生于此。西南师范大学又是文化名人吴宓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地

方。现在 ,西部大开发给我们提供了发挥历史积淀的新条件。

我们学位点面临少有的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这是我们的幸运。

同时 ,我们又遭遇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们的使命。

作为一所国家教育部直属大学的重点学科 ,作为西部唯一的中央直辖市——重庆的重点学科 ,我们应当有所作为。我深信 ,我的同事们一定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把学位点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把学位点的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为西部大开发、为重庆直辖市的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最后 ,谢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他们的支持 ,《文丛》的出版才能得以从计划变为现实。

# 绪摇论

## （一）

摇摇本书以 1917 年 1 月至 1927 年 1 月为时间论阈,以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存在样态、生成理路为研究对象。

将时间论阈限定于 1917 年~1927 年,一方面是出于众多现代文学史、批评史著作习惯于类似 1917 年~1927 年、1917 年~1927 年、1917 年~1927 年的分期方式,这种划分,与现代中国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受政治分期的影响比较严重,但由于重大政治事件对现代文学的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分期仍有其巨大的合理性,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要把政治逐出新文学史的领域,并非轻而易举,而且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sup>①</sup>另一方面,从话语形式层面来看,现代汉语诗学发端于 1917 年的文学革命论,在随后的 1920 年间,话语主体、话语方式、话语文

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本等几个环节都经历了多次转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已基本成熟并开始定型,几乎涵盖了在此之后出现的各种形态。再者,吴冠中-吴冠中~~吴冠中~~年间,文学与诗学的发展,虽然受到外在环境的巨大干扰,但总体看来,文学、诗学的内在规律仍不失为重要的制衡因素,或者说,这段时期,文学、诗学的发展基本上属于常态性质;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则将文学的发展纳入了比较彻底的人为设定的框架之内,文学批评的标准自然也将民族性、政治性等因素放在了首要位置,从而使文学、诗学走上了非常态或超常态的发展历程。对非常态的文学现象进行描述与分析,自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若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非常态的现象毕竟只是整个文学发展史中的暂时性现象,对之进行分析所形成的认识,相对说来也就不具备恒久之价值,或者说不能为今日常态诗学的发展与建构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题中所谓“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内涵是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学者运用现代汉语语词,对现代汉语文学进行批评,对古代文学、诗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以及对文学自身性质进行研究的方式与结果。这即是说,此处所谓的“诗学”是就其宽泛意义而言,包括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等几个层面,这种界定的根据是基于雷纳·韦勒克、奥斯丁·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关系所作的描述与区分。<sup>①</sup>

所谓“话语”(吴冠中~~吴冠中~~) ,不仅意味着本书注重现代汉语诗学的话语层面,更主要的是强调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即“话语分

<sup>①</sup> 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吴冠中~~吴冠中~~年,第171页。在《批评的概念》一书中,韦勒克对三者之联系与区别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任何想取消这些区分的作法都是行不通的。参见张金言译《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吴冠中~~吴冠中~~年,第15页。

析”。话语理论研究与话语分析实践在西方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派别众多,对“话语”的解释也很不一致。米哈依尔·巴赫金强调话语的对话原则,米歇尔·拜肖偏重话语意识形态的分析,米歇尔·福柯注重于话语权力因素以及思想史上种种断裂与差异性话语的特征。<sup>①</sup>就我国学术界而言,一般认为,“话语”是比语言小、比句子(或言语)大的单位,是在特定的价值水平上表达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口语或书面语句单位。<sup>②</sup>此外,有学者赞同保罗·利科“话语是实现了的语言”的论断,从而强调话语所具有的主体间的交流关系。<sup>③</sup>

本书所运用的“话语分析”方法,将不局限于某一流派的话语理论与分析模式。因为,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与古代以及西方诗学话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吸纳与复杂的迎拒关系,在话语分析时,必然要涉及古今、中外之间种种显在的交流与隐秘的对话;又因为,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生成与发展同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的特殊历史语境密切相连,在进行话语分析时,自然要涉及话语与文化、阶级、意识形态等的关系问题;另外,福柯话语理论对断裂与差异的强调,更是本书所凭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因为本书预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与传统诗学话语之间的断裂与差异大大超过了两者之间的延续与相似,而这一事实的形成又与西方诗学话语大规模潮涌而入,并在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

① 关于这几种话语理论的具体介绍,请参看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79-100页;王晓路《话语理论简介》,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陈晓明《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29页。

③ 周宪《超越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8-29页。



话语实践的结果就是可见、可读的话语文本,纵观一系列文本,就能发现一个时期内整个话语的延展理路。

在近十来年的中国学术界,对“话语”予以理论探讨的文章已经屡见不鲜,但在文学研究中运用话语分析方法的范例并不多见,而著其先鞭的是曹顺庆先生的《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1998)以及李杰的《中国诗学话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尽管这三部专著都未专门分析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但对本书无疑具有巨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近年来,在文学文体研究浩大声势的鼓舞之下,对批评文体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除单篇论文之外,已有至少三部可供参考的专著,一是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合著的《文学批评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将文学批评视为一门完整、独立的文艺新学科,从批评本体、主体、文本、方法等几个层面进行建构;二是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论述2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类型与范式;三是蒋原伦、潘凯雄合著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泛论20世纪中外批评文体的基本模式。

## (二)

现代汉语文学批评的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这一研究的起步相当早,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进步尤其迅速,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系统性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如王永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988),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

大学出版社, 1984), 高利克著, 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87—19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988—1989)(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等。第二, 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著作也纷纷涌现, 如李何林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 1933,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再版), 魏绍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5), 许志英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赵福生、杜运通著《从新潮到奔流》(1987—1991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猿卷)(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刘增杰著《战火中的缪斯》(1987—1991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源卷)(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邵伯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 1988), 马良春、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吴中杰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等等。第三, 1949年代后期, 特别是1956年代以来, 从比较诗学的角度, 对现代文学批评与外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发表了众多单篇论文,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五四”时期及1949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罗钢, 《中国社会科学》, 1985年第4期), 《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上篇)(陈思和, 《鸭绿江》, 1985年第4期), 更主要的是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专著, 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与1949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罗钢著《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殷国明著《1949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等。

上述研究成果注重资料的搜集, 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历程, 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对重要理论家和流派的

批评思想、观念及其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都给予了梳理与概括。但是,除了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一书中用两小节的篇幅,对现代文学批评的模式与文体作了初步的探讨外,其他众多的论著都未能对现代文学批评独具的言说方式、衍生机制与文本特征等给予关照与分析。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者们,将眼光主要投向了现代汉语诗学观念层面(即言说了什么)的发展历程,而对其形式层面(即如何言说)的存在与蜕变方式未予重视,或者将形式层面的蜕变,看成是随着白话对文言的胜利而自然完成的,从而把诗学话语的言说方式问题置换成诗学的语言学问题,造成研究中的盲视现象。再者,相当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即对建国前的部分多采用“史”的叙述方式,而对建国后的部分多采用“论”的研究方法。由于学科性质的决定,这种默契本来无可厚非,但应该看到,“史”的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注重历史性演进所造成的各个时期的差异性的同时,对共时性层面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的概括与提炼则显得不够全面,对现代汉语诗学话语形式层面的忽视,也与这种文学批评、思潮的“史”的研究模式有关。

20世纪的中国学界编纂了数量非常可观的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以及文学理论类著作,对1911年以前的这几类著述进行综合研究与评价的论著尚未出现,但已经出现通论20世纪文学史编纂情况的专著,如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魏崇新、王同坤合著的《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1999)等。对文学理论著作的编纂情况,在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中,都给予了比较简略的介绍。对20世纪众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进行整体评价的专

著至今尚付阙如,但在具体介绍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的一些论著中,涉及到对部分文学批评史著作的评价。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与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也勾勒了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刘大杰、阿英、朱自清等人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成就与贡献。与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一样,上述这些著作的侧重点也是在观念层面,较少从话语形式层面对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等几方面的著作进行描述与分析。

### (三)

本书将以上述各方面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为知识背景,从他们所忽视的话语形式层面入手,希望获得一个比较宽阔的言说空间,对中国现代诗学最初 100 年间的发生、发展与存在样态作出别样的描述与分析,以期获得如下几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换一个角度打量一段历史,会发现其他视角不能发现的新内容。所谓历史“真实”永远处在历史研究者的建构之中,视角不同,历史呈现出的面貌也就不同,给我们的启示也会不一样。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诗学的话语主体、方式、文本、发展理路等进行描述与分析,会丰富我们对现代汉语诗学的生成与发展机制以及存在样态的理解,对当下诗学的建构给予新的启示。

其次,现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是中西古今文化、文学大碰撞的结果,研究现代文学,必然要具备比较文学的眼光,对现代汉语诗学的研究,自然也须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入手,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运用影响研究方法,考察西方诗学给现代汉语诗学造成的各种影响,或者以接受个体、流派为出发点,或者以思潮为出发点,

较少将现代汉语诗学与传统诗学、西方诗学三者放在一起,进行异同式的平行比较,以便更加彰显现代汉语诗学的特征。本书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将一定程度地取得这样的研究效果,是比较诗学阐发研究在现代汉语诗学研究中的一次新尝试。

第三,通过具体的描述、比较与分析,本书将揭示出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疏离传统走向西方的发展历程,这有利于加深对现代文论“失语症”的认识,也有利于从话语方式、话语文本等角度进一步认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否具有可行性,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走向成熟提供一份参考。

当然,本书可能面临一系列理论的或逻辑的诘难,比如有关的理论预设(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现代汉语诗学的现代化与西方化的一致性、话语形式可以剥离话语观念进行描述与分析等)是否具有有效性?现代汉语诗学话语在何种意义以及多大程度上走近了西方诗学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一系列“误读”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冲突、语言差异或者是源自社会变革的需求?应如何评价传统诗学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在具体的论述中将思考并尽量回答这些问题,使研究更深入,力求获得比较丰富的理论价值。

## 第一章

# 话语主体的审视

### 一、中学、西学与东学

#### ——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

10

摇摇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战”,即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激烈冲突与战斗。这场战斗,发端于器物层面的竞争,经制度层面的较量,而最终深入到伦理、精神层面的对峙。在层层交锋中,西学步步进逼,中学节节败退。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一次大决战。由于有大半个世纪的铺垫,西学取胜已成定局,中学则败退到极为尴尬的边缘地带。

伴随着这一进程,传统士阶层逐步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蜕变。这种蜕变的表现是全方位的,从生存样态、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阶层之间的显著区别。这里我们只对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进行考察与分析,因为,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主体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其他方面的具体形态。

## (一)

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

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sup>①</sup>

“滚”加深了“中学”的修养；“出来”，则意味着走向了“西学”。不过，这种理解虽然大致可以代表像胡适那样，从中国直接进入欧美求学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却不足以用来概括胡适那一代人构建知识结构的全部模式。比如《新青年》编辑群体中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新文学作家中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都曾留学日本，他们有关西方的知识，主要是经由日本这一中转站间接获取的。也就是说，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或之外，还有关于日本尤其是来自日本学问，对此，我们暂且称之为“东学”。

现代汉语诗学的第一代话语主体，即鲁迅、胡适一代，具有很高的中学修养。他们的启蒙教育，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或者说是旧式的。当1905年，因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联名上奏，清政府完全废除科举制度时，鲁迅（1881~1936）、陈独秀（1897~1957）、周作人（1898~1967）、钱玄同（1887~1954）甚至出生稍晚的胡适（1891~1962），都已经打下了比较深厚的中学功底。尽管，晚清几十年间，一大批学人都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纳入“体用”的框架之内予以描述，试图以此贬低西学的本体价值，缓解西学对中学产

①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7页。